

混乱与重构

魏晋南北朝社会与阶级研究

刘汉东 著



东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刘汉东，男，祖籍江西新余，生于广东韶关，郑州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历史学副教授。现为广州师范学院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岭南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广东省《岭南丛书》编委会委员、广东省青科联理事、黄埔军校研究会理事、广东儒学研究会理事、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理事等。

从事中国古代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史、文化史、中国文化等研究。至今已发表了 80 篇论文，其中 30 余篇或在国家级刊物发表，或在《新华文摘》、《历史学年鉴》、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复印和介绍。出版专著两部，书四本，担任四部大型辞典的编委、分卷主编，论著已达二百余万字。先后获得四项省级科研奖，十余项院校级科研奖。完成国家社科两项重点项目和两项省级社科重点项目，现另承担两项省级重点项目。

序

历史，是无数人们活动的过程；历史，是人类已经逝去的昨天。历史本身往往并不愿意喋喋不休地告诫什么，历史就是历史。而且在严格的意义上说，历史是陈列的展品，供许许多多的人览视参观之后，得到许许多多富蕴哲理的启迪。历史是文化、知识、经验、习俗、传统、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等等的综合体，是人类前进的双脚之一。人类前进的另一只脚是科学。

历史，首先是活生生的人言行举止的结晶。山壑间的小溪因为跌宕起伏而给人以深幽的美感；千百年来的历史，因为人们将自己的愿望、理想、心态渗透入创造过程，所以多姿多彩。人们或者忧患历史，或者藐视历史，或者崇仰历史。但是，无论谁都不可能与历史绝交。试想，有人能做到吗？

既然我们不可能与自己的历史一刀两断，我们就应该正视历史，尊重历史，从中获得教益，加以扬弃，从鉴识历史来推动社会前进。如此，我们必然就要时时在历史中巡视，来得到应该得到的升华。假设我们忘记了这一点，或拒绝去做这一点，总有一天会发觉自己误入歧途，然后就像南唐后主李煜那样表示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凉心态了：“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可以肯定，有一个真实的历史。发生过的一切，都是确切存在过的事实。同样可以肯定，每一个认识历史的主体必然会加入主体意识，因为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做不到绝对客观，他的价值总在起影响作用。从而，使历史带了转形或变形的面具，而成了不完全真实的历史。

因此，既然我们要从历史中获得一些什么，我们就不能单纯

地只是直接描述历史。简单的历史常识已经不够了，已经不能够再使现代智慧有大的增加了。需要以新的角度新的方法研究历史，得到一种观念的进步。本书正是基于这一想法，力图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各阶级、阶层、群体是如何以自己的行为构设历史的状况，来认知他们所组成的社会和社会大背景，最终认知中国历史、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轨迹与阶段性。

社会，就像是风云变幻的大沙漠，每一瞬间都在流动。流动当然是较为温和的方式，流动不是动荡，而社会也不可能总是处在动荡之中。流动可以没有结果，流动又可以构成流荡。这些虽然常常在静悄悄中发生，而又恰好使人们得于从中鉴识历史时期的社会。人生有长恨，江水自长动，社会和历史总在悄悄流动。阶级、阶层和群体，就如同这一流动中的沙丘、沙河和沙漠，个人是其中的沙粒和尘埃，不时地移动位置和变换相互间距，构成社会的流动和社会能量的流动。

认识这样一个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大背景，将微观的研究成果与宏观的理论总结综合在一起，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学术、历史等的全面认识，无疑将极有补益。于整个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全面认识，同样极有补益。这就需要以大文化和大历史的高度，充分吸收过去多年的研究成果，对这一时期的社会和阶级加以分析，得出有助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特征的结论来。

结论首先当然必须忠实于历史事实，而这自然就要从可靠的史料中得出来。充分使用真实可信的翔尽史料，运用新角度新方法和扩大视野扩大范畴，就可以得到满意的结果。

本书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社会和阶级、阶层、群体所作的探讨，就是本着此意进行的。本书所研究的时代，局限于魏晋南北朝时代，是因为该时代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地位突出，是历史、

传统、文化的转折期。该时期以前，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时期，而该时期以后的隋唐时期，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阶级等方面都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有着许多的不同特征。

虽然，中国传统社会由于农耕产食结构的原因，自从进入有阶级和国家的文明时代以来，在社会形态上没有典型的鲜明的分界线，以至有关古代史分期问题的结论有多种，时期竟从西周直到宋，拖了两千余年之长。但是，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阶段特征还是明确的，有区别的。而其中历史与传统转折期的魏晋南北朝时代，特征更为明确。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以及中国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的总体构架基本上是由早期一直往下延续，所以，历史阶段特征十分重要。而这些特征的外在表现形式，主要体现在思想理论、政体形态、政治录用（选官制度）方式、赋税制度、经济形态和社会群体构成等方面。

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理论，在礼乐制度基础上，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争鸣，各提出一套体系，至秦汉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本质上是礼乐制度、孔孟学说与道、法、墨等集大成的思想理论，以伦理型仁政观与道德型礼教观为核心。两汉经学、魏晋南北朝玄学、宋明理学等，都是其类型，只不过有的差别很大而已。

中国传统社会的政体形态，又可称为政治模式，可以划分为三大历史类型：原始民主模式、贵族政治模式、官僚政治模式。每一个大类型中又可以划分具体的类型，官僚政治模式就可以有以下划分：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模式（约为秦汉时期）、君主门阀士族互补分权专制模式（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集权官僚政治模式（隋唐时期）、中央集权君主官僚互渗专制模式（北宋至清末时期）等。

中国传统社会中政治录用范畴的选官制度，主要有乡举里选（夏商周三代）、宗法血缘权力承嗣方式（先秦）、客卿与赐爵制度（战国、秦、汉前期）、察举征辟（两汉）、九品中正制（魏晋南北朝）、科举制（隋唐至清末）。

中国传统社会的赋税制度，不同阶段所产生的变化，主要是三代的贡彻助、春秋时开始变化的田赋制、两汉的租赋更（即田租、算赋、征役）制、魏晋南北朝的户调制、隋唐的租庸调制、唐后期的两税法、宋代的商税地税法、明后期的“一条鞭法”和清代的摊丁入亩法。

传统社会的经济形态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商业经济与自然经济结合后的半商业半自然经济两种经济形态交替出现。这种交替有一个基本规律，即凡是盛世时期，如秦汉、隋唐、北宋、明前期、清前中期等，经济水平较高一些，社会中就存在半商业半自然经济形态；反之，如魏晋南北朝则存在自然经济形态。

社会群体或阶级、阶层的构成则是以下形式：宗法血缘式（先秦）、血缘财产官职综合式（秦汉）、门阀观念式（魏晋南北朝）、财产户等血缘综合式（隋唐至明清，除元和清的某些部分）、民族异同式（元，及清的部分）。

上述历史阶段各方面特征的体现，有一个极大的特点，即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各个方面都是处在转形期的重要地位上，总结前一历史时期，启发引导后一历史时期。

作为历史与传统转折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和魏晋南北朝文化，将现实的和理想的政治价值观和人格价值观有机地揉掺起来，作为民族政治心理，代入伦理道德范畴，完成了此时期的总体构架并规定了其趋势。作为这历史阶段特征和传统文化转折的结果，就是这么一个场景了：思想理论方面由儒学往玄学变化，此后形成程朱理学体系。政体统治形式和政治模式，前一时期的中央集权

君主专制形式往政出多门的门阀政治变化，此后形成更完备的君主与臣吏协同相渗的中央集权官僚政治体制。人才选官形式和政治录用模式从血统和体现身份财产的“德”往“才”变化，也就是将上一时代较宽的社会面经魏晋南北朝时期极为狭窄的社会，转化到敞开的社会面，此后，形成科举文官制度，原则上使任何人都可能有机会。赋税制度方面虽然没有特殊之处，主因却在于传统社会中的农耕产食结构不变。而经济形态，魏晋南北朝则正好夹在汉、唐两大盛世之间，实行了最彻底的自然经济，甚至长期取消货币，几乎没有商品经济可言。社会群体、阶级、阶层的构成形式也使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位重要，门阀的观念结构结合其他因素，使社会群体层次众多，身份地位复杂，整体性和社会性的卑微低贱化。

此外，还有相当多其他领域的变化。如佛教的传播、道教的复兴和俗文化的抬头等等，这些因素作为该时期文化的总体构架和取向定势也十分重要，进一步促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中国历史和传统的转折。

正是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历史上的如此重要地位，因此，提供一个此时期社会和阶级、阶层、社会群体的背景材料，无疑将增进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和传统加以认知和把握的能力。

本人不揣鄙陋，来尝尝这个梨子的滋味。根本所想的，还是考虑到抛砖引玉，以请更多的莘莘学子“出山”，来推敲月下的寺庙大门，以便真正做到对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或一种具体文化，都像一棵大树。它的根深深深地扎在土壤里，一旦离开它赖以生长的土壤和环境就会失去生机。它的躯干是坚实的基础主干，在此之上分大枝小枝和树叶。同时，它仅靠从土壤中吸收的养分并不够，还要吸收阳光和雨露。因此，它的枝叶伸向浩浩蓝天，伸向开放的外部世界。

所以，更多的人来尝梨子滋味，来推敲月下山门，正是使这棵大树更为茁壮的最佳途径！

刘汉东

1989年2月8日

于郑州大学东 16—2—7

目 录

1 序

1 第一章 高贵的自封与寒微的崛起

——士族、地主及其层次与政治和社会

- 1 第一节 有序到混乱的社会转化
- 7 第二节 门阀士族的垄断及其固步自封
- 15 第三节 庶族寒人的政治崛起
- 20 第四节 寺院的财富和穿袈裟的富翁
- 26 第五节 门阀政治下的层次与社会

32 第二章 农夫们的命运

——农耕社会与自耕农

- 32 第一节 永恒的贫困窘态
- 42 第二节 沦落与卑微
- 49 第三节 自耕农的时代特征

57 第三章 体能的出卖与灵魂的回赎

——雇佣劳动者群体结构

- 57 第一节 体能的出卖
- 67 第二节 灵魂的回赎
- 74 第三节 雇工群体的类别与结构的性质

83 第四章 混乱无序的构架

——人身依附关系与依附民

83	第一节	变态和扭曲：依附关系强化与合法化
94	第二节	庇护—被庇护结构和类别
106	第三节	亦兵亦农：准军事化双重职能组织体系
111	第四节	依附民的社会区位与依附的复归轨迹
119	第五章	传统社会的悲哀
		——消失的荫户与假死的隐户
119	第一节	难得的高攀
124	第二节	最低的信任感和最高的躲避度
131	第三节	官家与私家的搏斗
136	第六章	七彩世界里的阴影
		——权力转换造成的吏、役、力状态
136	第一节	官僚门阀垄断的绝对化
		——低级吏的卑微过程
141	第二节	两极分张的绝对化
		——吏与力、役的结合
147	第三节	群体定型的绝对化
		——吏的各色名称
156	第四节	“官本位”利益的绝对化
		——给干和食干
162	第七章	他们乞求自由
		——特殊的营杂户群体
162	第一节	独特结构中的独特现象
169	第二节	营杂户类别种种
173	第三节	结构中的角色扮演
180	第八章	一个奇异的社会群体
		——兵户状况与心态
180	第一节	士家与扫荡群雄

		——曹魏士家与士家制
188	第二节	奇妙组合的协奏曲
		——东吴兵户与领兵、复客、奉邑制度
197	第三节	安抚和凝聚力
		——西蜀兵户与给兵、部曲分统制度
201	第四节	每况愈下与日薄西山
		——两晋南朝兵户与营户制
205	第五节	农牧撞击和部落与村社的交融
		——十六国北朝兵户与营户制
213	第九章	末业与末途
		——被套上脖圈的百工和伎作户
213	第一节	百工伎作众生相
220	第二节	自由之路：工匠身份发展趋势
227	第十章	另一种生活
		——罪犯与刑徒
227	第一节	社会犯罪面面观
239	第二节	刑徒囹圄中的无望与希望
246	第三节	挣扎与反抗
252	第十一章	当奴做仆心酸泪
		——在社会底层被碾压的奴婢
252	第一节	荆棘丛丛的沦陷之途
264	第二节	永无宁日的劳作
271	第三节	悲惨凄凉的境遇
276	第四节	自由的期盼
284	第十二章	盛世的转折与秩序的重构
		——政治、社会和阶级的交替过程。
284	第一节	社会结构特征与盛世的转折

290	第二节	阶级结构特征与群体重构
296	第三节	新政治模式与新秩序模式
305	后 记	
307	附 记	

第一章 高贵的自封与寒微的崛起

——士族、地主及其层次与政治和社会

第一节 有序到混乱的社会转化

从有序状态向无序状态系统变化，来自于社会系统中能量从集中状态到耗散状态的变化过程。在一定的社会中，某些能量基本稳定在一定的值度上，特别是政治资源的状态有一相应的稳定值，以保证政治能量的集中，向政治体制提供政治支持，维系其政治过程，发动运行机制，以保障政治的合法性。政治资源主要包括人才、官吏队伍、财政收入、军队等国家机器和各利益集团的有效支持等。通过社会的集体努力，有可能调动政治资源以及通过政治资源调动社会其他能量，处于一个能量集中稳定有序的状态中。

但是，人们在复杂的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中，往往意识不到在忙于某种建设或破坏，某种添置或排除，某种交换或转化时，正身不由己地抵消部分能量，使之成为不能再作功的无效能量。无效能量的增加意味着有着相应稳定值的有效能量总和的减少，从而使越来越多的能量从有效状态转化到无效状态，从集中状态转化到耗散状态。

处于混乱与重构状态中的魏晋南北朝社会，从前一个历史时期继承下来的，正是这么一个从无序到混乱的社会转化过程。

西汉末年，假作谦虚的王莽，信手将刘家天下攫为己有，然后大行改制，天下嗷嗷，终于引发赤眉、绿林、铜马等好汉们揭竿而起。刘氏皇室远支后嗣刘秀，因缘时会，展现了其不世之才，中兴汉业，使刘氏帝国得以延续。但好景并不太长，此后经明帝、章帝二代，到公元88年，十岁幼儿刘肇登基为和帝，此后东汉政治和社会都走上了混乱日益严重的大斜坡。

和帝以后，迭出幼儿皇帝，他们压根不知道管理国政，也不懂官场政客们争权夺利的黑幕，外戚和宦官便都对朝廷大权垂涎三尺，展开了轮番窃掌国柄的狗咬狗之争。外戚和宦官的拼死相搏，有一规律，即每当皇帝幼小时，例以母后垂帘摄政，实际大权在外戚之手；一旦皇帝成长为成人，不愿受外戚支配，但又无其他力量可以借用，便依靠宦官打击外戚，收回权力，宦官也就必然威势薰天了。下一个幼主登基，此过程又将重复一次。在这些勾心斗角中，因为宦官受到皇帝极力扶植，势力往往大大超出外戚。

和帝登位之后，母太后窦氏临朝，其兄窦宪、弟窦笃、窦景立时显贵无比，专擅权威，以至文武公卿竟不与和帝接触，相与追随窦氏兄弟。和帝无奈，终日与宫内宦官相处。至十四岁，和帝不甘心受窦氏外戚集团控制，密谋除去窦氏，却又不敢相信接触过少的朝臣，因而依靠亲信宦官中常侍郑众图之。永元四年（公元92年）收窦宪及其兄弟、党羽，逼令窦氏兄弟自杀。和帝为感谢郑众并众宦官，封郑众为鄯乡侯。自此以后，宦官得以享受爵封特权和担任宫卿职务，参与用权执政，势力开始大盛。

和帝以二十七岁之年早亡，以少子刘隆即位为殇帝，时出生才百余日，次年八月夭折。十三岁的安帝刘祜即位，朝权握在邓太后及其兄弟邓骘手中。邓后以青年女主临政，由于封建道德规范的约束，不能与众官僚亲自见面，参断帷幄，所以称制下令不

能出房闱之间，只能由宦官传达命令。这样一来，阉宦们又可口含天宪，手握王爵，权势进一步增长。建光元年（公元121年）邓太后病卒，安帝即依靠宦官李闰、江京等除去了邓氏势力，迫使邓鹭兄弟自杀，宦官再掌朝权。

安帝死，外戚阎显立北乡侯刘懿为帝，仅半年而死，宦官孙程等十九人合谋杀阎显，拥立了十一岁的刘保为顺帝，有功的十九名宦官悉数封侯，权势炙手可热。顺帝后期，权力渐入外戚梁冀之手，顺帝死后，梁太后与梁冀先后毒杀幼帝，拥立冲帝、质帝、桓帝三人。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梁太后死，桓帝又与单超等五名宦官立誓言，悉诛梁氏朋党。单超等五人同日封侯，以致人称作“五侯。”

桓帝死后，宦官曹节等迎立灵帝刘宏，时窦太后临朝，太后父窦武与太傅陈蕃密商尽诛中官首领，被曹节侦知，与宦官十七人共矫诏将兵诛杀窦、陈等人。此时朝权尽在宦官手中，以曹节、王甫为首。曹节之后，以张让、赵忠为首的十二名中常侍把持国柄，任意胡作非为，恃权仗势，横行淫威，巧取豪夺，无限聚敛，谄给售奸，蠹国害政。

外戚与宦官轮番争夺，造成政治黑暗，经济破败，政治动乱，人民流离，国无宁日，是一个典型的无序混乱状态，最终带来东汉末年的残破局面。

政治上的黑暗不仅仅体现在外戚与宦官的权力之争，以及两大集团对社会和人民都实行苛政，大行贪残横暴的聚敛，还在于著名的党锢事件。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使士大夫阶层中相当的一部分人执意地追求理想价值，遵循孔孟圣贤教谕，对于政治要求实现伦理型的仁政，对于个人则要求实现道德型的礼教人格。他们往往具有宗教式的牺牲精神去追求理想价值的实现，以求得精神的平衡和心理的满足。他们利用传统文化模式和思维定势批判

脱离了这一轨道的政治权势和现实秩序，强调孔子所教诲的：“笃信好学，宁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1]对于不行善道而实行苛政虐政以致政治黑暗或社会混乱的政治权势，绝不与之同流合污。“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2]士大夫们不应汲汲于名利富贵，若与道相违，宁可以死相从于“道”，绝无改变“道”而相从于人的道理。名利不是目的，“志于道”才是目的。

士大夫阶层中追求理想价值、圣贤教旨和纯正传统模式的这部分人，在东汉后期外戚、宦官黑暗政治将社会推到无序状态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就是拒绝与外戚、宦官合作，主张“权去外戚，政归国家”，^[3]指斥“阉竖弄权，忠臣不进。”^[4]这些人士敢于与权贵豪势相抗争，为不少较为清廉方正耿直的士大夫、太学生和部分地主、官僚所赞赏，渐次成为社会名士，正如《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序》所云：

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繆，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覆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

他们结成名士集团，以声誉高低和品德相类、气质相从，而号称“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除全国皆知的名士集团之外，各地区又有本区域内的名士集团。加以此时政府太学中学员众多，顺帝时已达三万余名太学生。他们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年青的士大夫阶层成员，考虑到自身的仕途前景，对于外戚和宦官交递擅政，任用私人的现状，是极为不满的，所以十分积极地参与名士集团的批判运动。有如此多的太学生推波助澜，名士批判运动声势日渐涨大。

名士们先是与外戚抗争，崔骃、袁安曾反对窦宪，杨震不畏阉显，李固、张纲、杜乔力斥梁冀，都是一时佳话。到了桓灵二

帝之时的后期，主要是对宦官进行揭露和斗争。宦官大多出身卑贱，刀锯刑余，不仅生理上残缺，而且长期自惭形秽的压抑心理形成变态心理，因而表现出与一切所谓正直的士大夫和名士为敌的感情色彩。在他们确保权势又得到皇帝支持之后，便对名士集团的指斥一刻也不能容忍了。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名士李膺、范滂等二百余人被指为党人，下狱治罪，百般凌辱拷打。此为第一次党锢之祸。此后三年的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宦官侯览指使有司奏捕党人，并下令各州郡钩党，狱死者百余人，受禁的六七百人。党人及其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全都免官禁锢，祸及五族。此为第二次党锢之祸。从此，士大夫和官僚阶层与宦官间的矛盾日益激烈，成为何进、袁绍等尽诛宦官而天下大乱的直接导因。

两次党锢事件之后，宦官垄断了各种官职，“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贪残，为人蠹害。”^[5]致使经济破败，人民流离。阉宦们肆意敛财，欲壑无限。灵帝刘宏也贪财成性，他本只是一个式微了的刘姓分枝，向来家贫，做皇帝后讥笑桓帝“不能作家居”，因而决心广聚私财。^[6]为了广开钱源，竟在西园公开卖官卖爵，分别大小高低及油水肥瘦，分等收钱。张让、赵忠又劝灵帝收敛天下田亩税，每亩十钱，称为“修宫钱”，入其私库。地方官吏及宦官亲信也趁机大饱私囊，弄得百姓怨愤，民不聊生。

黄巾起义因此在此期间而起，震动各地。但是，张让、赵忠等宦官封锁消息，不让灵帝知道内情。黄巾起义固然有着复杂的原因，宦官集团一系列的倒行逆施，造成人民生路维艰，倒毙行路，社会经济空前倒退，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不断激化，也是促使东汉帝国解体和进入耗散无序状态的決定因素之一。这就使外戚与士大夫和官僚阶层携手，展开了与东汉宦官的决战。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灵帝病死，事关东汉宦官集团被全